

你说我听



一部台州人随笔,记载了张献忠藏宝秘密

本报记者诸葛晨晨文/摄

“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两,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这句关于张献忠藏宝的民间歌谣流传了数百年。

明末天下大乱,义军四起,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部攻破成都,建立了大西政权。但没有过几年,张献忠从成都撤军途中,因部下背叛遭到清军突袭,最终被射杀身亡。

张献忠死后,留下很多历史谜团,最让大家关注的是,他征伐多年敛聚了一笔巨额财富,但随着张献忠的死亡,这些宝藏也一并消失……

清初,台州就有一位著名文人,整理了有关张献忠藏宝资料,还被清修《明史》的《流贼传》所采用。他是谁呢?

近日,台州市文史馆副馆长、台州学院教授、广文书院院长胡正武,在台州书画院作了一场题为《江口沉银知多少?——清初台州文人掌握张献忠藏宝秘密》的讲座,钩沉历史,详细分析张献忠藏宝的位置及历代挖掘情况。

讲座现场,胡正武揭晓答案,此人就是清初台州著名文人冯麴。冯麴在云南为官多年,官至刑部左侍郎。冯麴著有一部《见闻随笔》,提供了第一手的明末西南史事资料,这里面就有张献忠入川之后的记录。

《见闻随笔》现收录于2014年出版的《台州丛书甲集》(台州文献丛书)中,点校者正是胡正武。

讲座分为“入蜀如洪张献忠”“搜尽宝藏势汹汹”“沉银江口波涛卷”“天府锦岷恨无穷”四

个部分,结合《见闻随笔》整理的史料,勾勒出了张献忠屠蜀、沉银的始末。

根据记载,张献忠入川,大肆烧杀掠夺,让天府之国一度沦为人间炼狱,导致四川人口锐减。他大肆搜刮到贵族阶层的金银财宝,连普通百姓的家财也不放过,“又禁不得私藏金银,至一两者家尽诛,十两者生剐其皮”。其残暴程度可想而知。

张献忠到底聚敛了多少财富?胡正武摘录了部分原文:“使张文秀据数年所掠秦、豫、吴、楚珍宝兼金,凡巨舰百余,赴彭山县江口沉之。”张献忠在各地搜过来的金银财宝由张献忠的养子张文秀押运,最终满载金银的船只沉于江底。“只说‘巨舰百余’,船到底有多大?能装下多少财宝,没有人清楚。”胡正武说。

金银财宝沉江后,张文秀将现场部众悉数杀死,这样就无人知晓真正的宝藏所在。

时间到了民国,有人打起张献忠宝藏的主意。“1939年,四川有一个军阀范绍增来到江口沉银所在处打捞,在河底发现了许多人体骨骸。据当时专家认定,这些人便是张献忠沉银时被杀的民工。同时与遗骸一起被发现的,还有92块刻有‘张’字的条石。”

2017年1月5日,“江口沉银遗址”的水下考古挖掘正式开始。同年3月,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在彭山举行了“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阶段性工作新闻通气会。

位于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的“江口沉银遗址”经过严格的考察,证实是当年张献忠沉银中心的其中一个区域。

经过两个多月水下考古,遗址现场出水文物超过1万件,除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大顺通宝铜币、金册、银册、银锭,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还首次出水铁刀、铁剑、铁矛、铁箭镞等兵器。江口遗址出水文物的丰富、级别之高和种类之全面,全国罕见。至今没有哪一个古遗址出水那么多高级别的文物。

抛开诸多历史争议,张献忠藏宝的传说,也透露出当时变化频繁的复杂社会现实,各方势力在争夺攻伐的过程中,广大黎民百姓深受其害。

讲座结束后,记者采访了胡正武,了解其对江口沉银事件的看法。

作为《见闻随笔》的点校者,胡正武表示,当时在整理资料期间,读到这些沉银文字时,感到非常震惊。“震惊的不是如此大的数量,而是它用如此恶劣毒辣的手段所取得,远非一个正常人所敢想象。”

时至今日,在看到江口沉银遗址出水如此丰富的金银文物时,胡正武又感到极度的痛心。“痛心的不是这些金银宝物与泥沙同入波涛,而是如此大量的沉金银浪浪抛掷,只有一点零头出水,而大量的沉宝都已经被毁于沙石洪流之中,附着它的原主人的艰辛、心血与冤魂。”



在自然面前的自知渺小,与在凉山人面前的自知平等是同时存在的

确证故乡,从行走开始

——读何万敏《凉山纪》

张家鸿 / 文

关于家乡大地的非虚构写作,如果缺少一次次亲身走过、亲手碰过、亲耳听过、亲眼见过,很难想象会写得神完气足。一味抒情,并不是非虚构写作的适宜之路。以记录为主,写实为首要,兼有点到为止的情感流淌,方为非虚构写作的正道。何万敏的《凉山纪》就是这样一本书。

写作从行走开始。原本可以抄近路返回县城,他却特意沿着螺旋式乡间公路爬升到坪坝乡,由此至海棠镇,走的正是清溪古道的一段。从野牛坪到鹿鹿,需顺着褶皱的沟底逐渐往上爬,这一爬即是两个小时,否则无法于夜幕降临时顺利落脚友人家中。为寻觅一处理想的拍摄点,于隆冬季节的荒草间、无路可走的陡坡上兜兜转转,摸索一个多小时之后停下脚步。停步之地还是逼仄。从冕宁县锦屏镇出发,沿着雅砻江溯流而上,流连忘返于大河湾一带,很显然,行走是《凉山纪》的源头。若无几十年里和凉山大地的亲密,断无这部厚重的著作摆在于读者面前。

于行走中遇见,是缘分,也是解读,解读眼中见到的一个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故事。担任板洛洛村党支部书记的阿侯娘,像庄稼一样在那块土地上成长起来。数十年与村民相处,哪一家的家底,哪一户人的脾气,他都不陌生。在他的主持下,村里统一把村民需交给电力公司的钱垫上,为村民谋福利的同时且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在村里安装45盏路灯,有红白喜事和每逢过节全开,站在山上看村里光亮得像城里一样。

有责任心、使命感的人,他们不是何万敏讴歌的对象,而是忠实记录的饱含热情的个体。这些个体有基层干部,也有普通的村民。会东县东德镇鹿鹿办事处黄草坪村人潘友明被作者视为亲人。当何万敏与朋友们一行七人到达他家的时候,潘友明已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除却清炖鸡、腊肉、四季豆、芥丝、辣椒,还有小灶酒和罐装啤酒。即将入睡,潘和妻子拿出七八双五颜六色的新拖鞋,扯掉商标后,又端出几盘热水让客人舒筋活血。他们自己打地铺,把床铺让给客人们。在荒僻的他乡,简陋的村落里,得着如亲人般的呵护与关怀,何万敏自觉“谢谢”二字的难以启齿。

“王妃”二字记录的只是肖淑明婚姻的陈迹,身为土司的老婆给她带来的往往是往后岁月里政治遭遇上的诸多不顺,被批斗、被逮捕、被判刑。在农场改造期间,她学医、搞统计、当保管,直至八年刑满时留队。不管人生经历如何,这个从成都远嫁至泸沽湖,未曾回去过的弱女子,有常人少有的坚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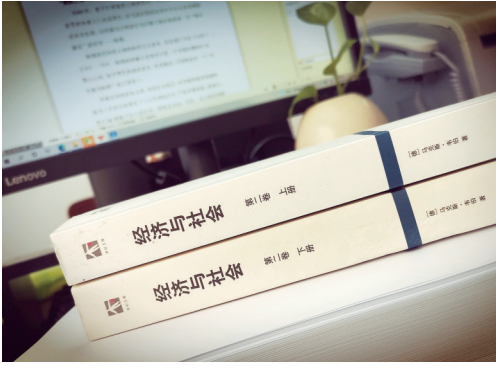
这些或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遇见,令作者心灵经受一次次洗礼,甚至震撼。凉山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结合得如此完美,才让凉山成为最为独特的人间胜境。邛海的美浑然天成,如一面明

镜点缀在群山之间,是刚硬中突降的柔美。上游的悠缓散漫、中游的放浪不羁山呼海啸、下游的弯曲急转,让雅砻江的蜿蜒尽显妖娆、壮美。茶马古道上的铜铃声自静默的大山和茂密的密林中传来,是不绝于耳的悠扬之美。泸沽湖如处子般的静谧之美,令人仿如身处世外桃源,有结庐于此的冲动。彝族人天生的好嗓音,或自信或热烈或激昂或狂放,打动着五湖四海的音乐爱好者。

何万敏书写凉山大地,不仅有他的文字为证,还有美轮美奂的照片呈现出更为直接的效果。泸沽湖湖水的蓝与山的蓝于夜幕降临时融为一体,老君滩的蜿蜒雄伟令人不禁凛然,德布洛莫山间云雾缭绕时的神秘,都被装进他充满诗意的镜头里。“面对高天白云、深山峡谷、江河奔涌、淳善兄弟,我默默被全部的感动彻底征服。”在自然面前的自知渺小,与在凉山人面前的自知平等是同时存在的。在二者面前,作者都是被感动的对象。如此一来,凉山则像一册读不完的大书,何万敏品读之后写出的《凉山纪》充其量只是其中的一个个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故事。担任板洛洛村党支部书记的阿侯娘,像庄稼一样在那块土地上成长起来。数十年与村民相处,哪一家的家底,哪一户人的脾气,他都不陌生。在他的主持下,村里统一把村民需交给电力公司的钱垫上,为村民谋福利的同时且不增加他们的负担。在村里安装45盏路灯,有红白喜事和每逢过节全开,站在山上看村里光亮得像城里一样。

基于两个维度的认识,何万敏于书中传达的不仅是赞美,还有未完结的思考。年轻人改穿街上购买的廉价时装,羊毛披毡与百褶裙日渐罕见,独特的审美准则已成旧日的回忆。这是肉眼可见的变化。在亲眼目睹打发达巴向儿子亲口传授《哈那古》的情景后,作者写下如此倾述。“文化之魂如风飘逝,如果真的消失了,那是一座博物馆的坍塌,考古也无法考出来,因为那不是埋在地下的文物,是与人的血脉、泪水、呼吸、灵魂相连的无形的宝藏。”正如外人对摩梭人走婚制度的误读,《哈那古》的讲授也遭遇显而易见的困境,传统文化的何去何从在凉山这片土地上依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此可知,《凉山纪》以地理位置的变幻为线索,兼及历史、人文、地理、艺术、宗教多方面内容,全方位地展示了凉山地区与众不同的风采与魅力。未去过凉山的人,《凉山纪》就像一册入门书,尽管它带着作者鲜明的个人印记;去过凉山的人,《凉山纪》正如一本故事书,展读时看到的是许多凉山人的履历;去过之后还想去凉山的人,《凉山纪》是一册时时想来诱惑的文本,它一直倾诉着:凉山不远,就在那里;凉山之美,值得一而再再而三地探寻。



春花无数何如秋果

——读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

蒋晞文/摄

“阴阳之术”产生官僚主义

1569年,处于江南富庶之地的苏州,不少缙绅之家纷纷把家里的朱漆大门改成黑色;在当地任职的官员中不少人自动离职或请求他调。这些颇为古怪的行为只缘于他们将迎来一位“刚正廉直”的官员——海瑞。

海瑞是民间受人敬仰的青天大老爷,但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海瑞的清廉正直却并不是一个至臻至善的行为,黑白之间,似乎黑色的成分更多。百姓眼中的“大青天”,同事眼中的“惹事精”,同一个人,为什么会呈现两种完全相反的印象?海瑞的尴尬只因他处在一个以“至德为标准”的大背景下。

草根出身的朱元璋,身处社会底层,对贪腐现象深恶痛绝,他当上皇帝后就颁布了十分苛刻的法令,严惩贪腐现象。他规定: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一律格杀勿论。同时,朱元璋用残酷刑法处置贪官,采用“剥皮揸草”、挑筋、断指、断手、削膝盖等酷刑。

一边对贪腐人员行极刑之罪,另一边,朱元璋对自己的子孙施“亲亲之恩”。《明史》记载:“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他的子孙有皇权特许,第一是不受法律限制,亦不受地方政府管制。皇族可以仗着特权欺男霸女、鱼肉百姓,甚至强抢民女、杀人取乐也成为其中一部分人的消遣之事。第二,世世代代享受朝廷的丰厚俸禄,所有皇族后代的全部消费都由国家承担。这项政策让皇族宗室开展了“繁衍竞赛”,到最后竟拖垮国库。

明朝末期,每年用在宗室子弟上的俸禄就要占到朝廷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以圣人之德要求他人,以奢靡之行给予自己,朱元璋从一开始建立的就不是君主政治,而是僭主政治。这种双重标准下,作为连接平民与皇族的官员也大都实行“阴阳之术”。而海瑞为官时只认“圣人之德”,虽然自己也厉行节俭,但终究为人所厌。

“阴阳之术”最终导致官僚向官僚主义发展,它能生根的土壤是僭主政治统治下的传统文化。

传统、教育、制度是官僚主义源头

成熟的农耕文明带来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支持着强大的中央,这种社会结构下,导致人们追求利益的主要倾向不是靠自己争取,而是靠自上而下的分配,搞关系、依附权力都能获得更高的利益分配。人情关系网成为官僚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而事实和规则虚浮成“阳面”,成为一种只宣之于口的道德标准。如海瑞一般,严格遵守法规,按照最高限度执行并要求他人的道德模范,在官僚主义体系中只能成为一个“只会惹是生非的大众英雄”。

经济是社会的行动总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官僚是经济与政治的最密切结合者,他们的专业、素质、理想、道德决定着行政系统的走向是官僚主义还是官僚制。

官僚主义产生的源头有三,首先是传统对规范的影响夹带了大量的“私货”。私货之一是显贵支配,这是传统权威的重要形式,源自家长制。显贵支配最重要的形式就是特权,这个特权可以来自身份、名望、财产、地位、性别。私货之二是成员利益,来源于家产制。家产制的利益是为了满足私人家族的需要,只要能进入这个政治权力关系圈中,成员利益就能得到保障。

源头之二是官员教育。在古代中国的官员教育中,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是教育的根本目的,职业的专业训练几乎没有。韦伯在书中写道,“考试实际上是对个人教养水平的一种测验,以此确定他是不是君子,而不是确定他有没有专业素养。”以熟读诗书的文化人作为官僚治理国家,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制度,更谈不上保障百姓。海瑞的经历证明了个人道德之长,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的短,一个只有自我牺牲精神而无专业技术的“有教养者”,虽然能传递一种精神,但这种精神对实际的作用是非常微薄的。

源头之三是法律制度建设的缺失。朱元璋建国后对农村实行“两亭政策”。各村内设“申明亭”和“旌善亭”,前者仲裁纠纷,后者表扬善行。一年两次举行全体村民大宴,称“乡饮”,乡饮前聆听高道德者的训辞和选读的朝廷法令,同时申饬行为不检者,对不悔改者要求送去边疆充军。用抽象的道德代替法律教化民众,这些做法遏止了法制在底层的成长。因此,在明朝,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或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没有法制的成长,只有道德

的虚无,同时又把皇族子弟凌驾到道德法律之上,官僚主义就在这样一棵根基不稳的大树上开始枝繁叶茂。

官僚的理性主义是官僚制

如果说官僚主义是官僚的感性表现,那么它的理性表现就是官僚制。官僚制的产生有三个要素,官职义务、强制手段、拥有资格者。从构成来说,就是官僚+官僚机构。

官僚制不只存在于国家范围内,在私有经济中,官僚制有着更为清晰而有效率的作用,因为官僚制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行政职能。当然,官僚制也并不只在现代社会里才出现的,只要在上述三种要素齐全,官僚制就会产生,只是因为现代的国家私有经济中,官僚制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人们才渐渐熟悉了官僚制。

在这种架构下,国家范围内的从业人员称官僚,私有经济范围内的行政人员称职员。韦伯在研究中发现,这些人员的来源,在最初时大都来自神职人员。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神职人员是受教育范围最广的一个阶层,他们受过专业的书写和统计培训,足以胜任官僚这一职业要求。

官僚机构的体现是它的等级制,架构出一种上下级隶属体系,确定职责界限,服从于体系的权威而不是个人权威。

官僚机构对官僚的要求是,可以实现公共的、跨地区的、量化的供应。每个官僚都是官僚体系里的一个零部件,只要按上去就可以让这架机器运转。那么官僚对官僚机构的要求呢?第一,提供固定的薪金和职位,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求;第二,提供固定的仕途路线和身份尊严,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韦伯说,“有保障的薪金加上不依赖于偶然性和随意性的升迁机会,才能使一部官僚机器的严格化运行获得相对来说最大限度的成功并持之以恒。”

官僚制的本质是一部精密运转的机器,以可计算的规则履行行政职责,优点就是“无需看人下菜”。这种“无爱亦无情的冷漠”把人们从特权里解放出来,归属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大众民主中。

官僚制有着不容置疑的优势,这个优势源自它服从的权威不是人而是事实。韦伯写道,“官方统计资料的批漏并不会给责任官员带来直接的经济后果,但是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计算错误却会导致亏损,也许还会危及它的生存。”大规模的现代资本主义企业,本身就是无与伦比的精密的官僚组织。大型私企对官僚制的依赖要超过一些国家对官僚制的依赖,因为在商业领域中,精确把握事实对于经济生存具有最直接的重大意义。所以真正是官僚制权威的真正来源,也是现代社会的服从起源。

什么是真实呢?春花烂漫无数,若秋果寥寥,不过是空空一场。终究,不是看一个人怎么说,而是看他怎么做,这才是真实。